

研究述评

学衡派研究述评

张贺敏

从1922年《学衡》创刊起，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学衡派一直被视作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背负着“复古”、“反动”的恶名。直到8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并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们的著作、传记等陆续出版，研究他们的论文和论著也不断增加，研究的广度、深度都逐渐加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本文首次对学衡派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总结，相信会对今后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学衡派”研究简史

1. “学衡派”内涵的演变

“学衡派”是对围绕在《学衡》周围的作者的称呼，尤其指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几个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主力。该称呼并非他们自命，而是新文化一方赋予的。在《学衡》面世之初，也还没有这种说法。鲁迅的《估〈学衡〉》只称他们为“诸公”，周作人、胡适等人也没有用“派”来称呼他们。直到《新文化大系·文学论争集》第三编标题“学衡派的反攻”，才最早使用这个名称，而且带着胜利者的居高临下的意味。但郑振铎在导言中仍然把他们称作“胡梅派”，可见这个称呼在当时（1935年）还没有普遍使用。但1939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论》、1953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都使用了这个称呼，尤其

是后者长期被用作高校文科教材，影响很广。“学衡派”这个称呼也被以后的文学史和研究论著沿用下来，包括港台司马长风、李辉英^①等的文学史在内，但其最初的贬低色彩已逐渐淡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衡派”的内涵也悄然发生变化。80年代以前，这个概念只包括吴宓等几个最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批评者，对其他人、其他方面都很少涉及。在此之后，学衡派在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得到承认，汤用彤等其他作者也开始被纳入学衡派范围内。但由于对内涵扩大的以后的“学衡派”概念缺乏进一步界定，也使研究者的观点出现了某些分歧。如关于王国维、陈寅恪等比较“纯粹”的学者，孙尚扬认为他们也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由此强调《学衡》的学术性。^②谭桂林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学衡》的重点还是攻诋新文化运动，不是学术研究。^③笔者认为，批评新文化运动是《学衡》的一个基本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学术研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数量上看后者远远多于前者，而且学术水准也很高，如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汤用彤的佛学研究、王国维的古文字研究等。孙文体现了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学衡派学术成就的重视，这一点值得肯定。

《学衡》有100多位作者，是否都应算作学衡派？《学衡》创立之初，曾根据梅光迪的提议，规定凡为《学衡》写稿的就是社员。因此，沈卫威在最新出版的《吴宓与〈学衡〉》一书中，也把为《学衡》撰文者都视为学衡派成员。^④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学衡派人物有很大差别，这个名称抹杀了历史过程和思想过程的丰富性。^⑤笔者认为，虽然《学衡》作者在思想背景等方面很不相同，但他们的观点有其内在的统一性。把他们合称为“学衡派”是有根据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应该根据各自的论题，分清文化、文学、学术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不应泛泛而论。

在学衡派人物中，吴宓是当之无愧的核心。正是在他的艰苦支撑下，《学衡》才得以出到79期，他的文化精神也直接影响到该刊的方向。由于胡先骕、梅光迪是批评新文化的先锋，以往的批评也夸大了

他们在《学衡》中的地位。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纠正。

2. 历史上的批评

二三十年代，学衡派的反对者来自两大阵营。首先是新文化一方，其中鲁迅的《估〈学衡〉》影响最大。这篇短文以学衡派为复古的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敌人，而且对他们颇为轻蔑，认为不值一驳。^⑥胡适在日记中也把《学衡》称为“学骂”。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最有力的反对派，其观点也颇有可取之处。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一开始就是势不两立的互相攻讦，无暇取长补短。周作人也写了好几篇讨论文章，但不像鲁迅一样严厉，认为学衡派“只是新文化学的旁支，决不是敌人”，“不必去太歧视他的。”^⑦这一观点比较平和、客观，但在激进的文化氛围中，这个微弱的声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共鸣。在很长时间内，鲁迅对《学衡》的评价几乎成为盖棺定论。

《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总结，对以后影响很大。郑振铎在导言中把学衡派和林纾、章世钊并称为复古派，以胡先骕、梅光迪为代表。以后的文学史几乎都延续了这些观点，而且研究者们多以《大系》收入的几篇论文作为原始资料，根本不屑于看《学衡》的原文，因此在观点上也难有突破。

除新文学阵营以外，由于《学衡》上有批评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文章，也受到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邓中夏等人的批评。“文革”期间到80年代初的文学史都强化学衡派的“反动”政治立场，认为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⑧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言人”。^⑨但实际上，《学衡》上的这类文章是从学理角度出发的，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和目的，而且数量极少。与《新青年》、《现代评论》、《独立评论》大量的政治新闻、时事评论不同，他们更关心的是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邓中夏等人的批评是针对最初几期的，难免有所偏颇。在政治左倾的大环境里，这种偏颇被错误地变本加厉了。

总的来看，在 80 年代末期以前，学衡派作为二三十年代重要的保守主义文化派别，除了作为批判对象之外，一直没有引起大陆学术界的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和研究论著几乎都延续了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邓中夏等的观点，认定他们是复古派、反动派，是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的双重敌人。这些批评之所以能延续这么久，与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渴望以最快的速度走向现代化（西化），激进主义可以说是这个世纪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名声不佳。随着 80 年代后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学衡派也随之浮出历史地表，他们的文化观尤其受到关注，得到比较高的评价。90 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和研究论著已经不再从政治倾向上指责他们，如《中国社会党派辞典》^⑩、《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⑪等。只有个别研究者还坚持传统的说法，但已经不是主流。^⑫

二、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研究的新焦点

80 年代以来，文化激进主义遭受挫折，保守主义抬头（有学者提出 90 年代是新保守主义的时代，如孟繁华、张颐武等^⑬），“国学热”兴起，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⑭学衡派也重新受到关注，他们在文化方面的主张尤其受到重视。

在对学衡派的正面研究上，海外学者要早于大陆。早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海外学者已经把学衡派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1979 年傅乐诗提出：“……保守主义者如辜鸿鸣或《学衡》派诸子，提出欧陆的有机演化论。”^⑮李欧梵在 1983 年出版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明确提出学衡派是“文化保守主义”。^⑯但这种提法在当时的大陆学界影响甚微。

较早在大陆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著名学者乐黛云，她在 1989 年发表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⑰一文影响很大。以后的学

者往往接受了她的观点，把学衡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对激进派的制衡和有益补充。除了“文化保守主义”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折衷派”、“会通派”、“改良派”等不同说法。^⑮但总的来看，这些提法大同小异。

“保守主义”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海内外学者纷纷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互相辩驳，尤其以90年代中期为高潮。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大陆的《文学评论》、《钟山》、《上海文学》，海外的《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等都是主要的辩论场。2000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⑯收集了其中的主要文章。这些讨论构成了学衡派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背景，其观点分歧在学衡派研究中也都有直接的反映。

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关于传统与现代性

大多数论者都以五四新文化派为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以学衡派为文化保守主义。徐传礼认为他们的对立是激进的革命派与保守的古典派、稳健的渐进派的对立。^⑰旷新年在学衡派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尤其在理论上比较有深度。他提出，学衡派是最早对现代性和启蒙主义进行批评的，这已经涉及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五四新文化派总想寻求“根本解决”的办法，缺乏健全的心态和清明的理性，使传统受到毁灭性打击。从“反传统”到“接着”传统，学衡派是一个转折点。^⑱他还指出，学衡派与新儒家在思想上一脉相通，都强调儒家的信仰、情感价值，他们都是学术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⑲

也有学者不同意单纯以文化保守主义来肯定学衡派，李怡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五四并非完全反传统。这和严家炎、姜义华等在保守主义讨论中的观点一致。他指出，五四和学衡派对于传统文化都进行了选择和改造，前者重在“解放发扬”，后者重在“整理收束”，他们的

思路是相通而非对立的。²³

旷新年等肯定了学衡派对于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贡献，李怡则提示人们注意双方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复杂性，两个人的观点都很有价值。

(2) 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

在研究学衡派的过程中，学者们也注意到他们的西方理论来源——新人文主义，并由此把学衡派和传统国粹派区分开来。李怡对这种区别分析最细，认为学衡派的知识结构最新，而且没有很强的政治欲望，这些把他们与孔教会、甲寅派、康有为、章太炎区别开来。²⁴

学者们普遍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但增加了学衡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们眼界更开阔，能够提出世界性的文化理想。旷新年在《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中分析了白璧德对学衡派的影响，还指出学衡派的另一个理论来源——安诺德的文化论，表现在重视文化与批评的社会功能，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和使命感。²⁵张运华提出，吴宓等人的文化观超越了东西界限而具有普遍的永久价值。²⁶

也有学者对新人文主义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李建中提出，新人文主义是针对西方文化的危机而提出的，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而且它只是创造世界新文化的一种理想，学衡派想以此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结果必然失败。²⁷李怡更认为“人文主义”的概念不准确，认为白璧德等人其实是“新古典主义”。²⁸

由于白璧德等人的著作至今在大陆还没有中译本，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观点往往难以深入。要想进一步了解学衡派的理论，对新人文主义的翻译和研究势在必行。海外学者在这方面也捷足先登，侯健是其中的代表，他的观点在下文将有详细介绍。

(3)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学衡派以自己的声音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重新评价他们

与新文化阵营的关系，仍然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

学衡派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吸收外国文化，他们与新文化派的区别只是对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理解和侧重不同而已。新文化派是主流，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学衡派是有益的制衡与补充。这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大多数学者认为双方各自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又都有其局限性。学衡派是反观五四的一面新镜子，从中映照出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等等。但许多学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方，而是深入探讨双方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罗岗、魏建等都提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五四新文化派难以容纳保守主义，也使学衡派陷入农民起义式的狭隘心理中，只想“取而代之”。双方互相对立而没有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这是文化上的损失。今后应彻底抛弃二元对立思维，寻找新的文化评判标准²⁹，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三分法就是其中的一种。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反思并希望超越五四，学衡派研究本身也显示出这种超越的努力和成绩。

(4) 《学衡》杂志

在关注学衡派的同时，《学衡》杂志本身受到重视。《学衡》杂志79期重新影印出版。孙尚扬、郭兰芳编选的《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共选录了42篇代表性文章，又简化繁体字、为文言文添加现代标点，更方便阅读。³⁰

王泉根对《学衡》的办刊始末、出版发行情况、编辑力量、作者队伍、栏目、整体内容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该刊是现代中国一份内容庞杂但又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精神与理想追求的重要的文化研究刊物”。³¹

罗岗侧重于《学衡》“杂南文本”的分析，如它的编辑手段、栏目的设置及内容的变化等等，从中探讨编者的种种意图。他还指出，新

文化运动一方“之所以揪住梅、胡不放，关键不在两位是否代表或领导《学衡》，而是因为他们反对新文学运动‘甚烈’乃至‘最烈’。以至于把学衡派的一个倾向放大成该杂志的唯一倾向”。^②这个观点是令人信服的。

沈卫威对于学衡派的整体研究贡献很大。他的《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是研究学衡派的第一本专著。既有总论，又有对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的个案分析。^③2000年他又出版了《吴宓与〈学衡〉》，详细列出《学衡》每一期详细目录，并记录与杂志有关的重要的事件。这两本书在史料方面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其观点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总之，近年来对学衡派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方面进行的。学衡派之所以在80年代末开始受到关注，既与近年来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有关，又是当代研究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学衡派对文化改革的稳健态度、对世界文化共通性的思考和坚持都得到肯定。通过对学衡派的研究，不只加深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而且对于身处世纪之交、面临新一轮文化选择的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学衡派的文学观

学衡派最关注的是文化问题，又以文学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衡》是文言文的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在文学批评方面贡献尤多。这些作者的文学趣味、取向和理想大同小异，在大方向上却与新文学背道而驰，尤其是他们对文学革命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因此其文学观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贬低和否定。

早期的研究者从反对白话文学方面来批评学衡派，但也注意到他们的理论并非是复古的延续。而是有西方的理论来源，但不屑于深入分析。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指出，他们有“古典派”立场和西方文艺理论，是与传统文人不同的。^④李何林在《近

二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也说他们“大有‘古典主义’者的口吻，……可惜因为只是代表旧势力的最后挣扎，未能像西洋似的形成一种‘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潮，而且没有什么作品”。以后的研究者连“古典主义”都极少提起。李何林还提出，“反进化论”和主张“摹仿”是他们文学观的核心³⁵。后来的研究者如王瑶等都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以此作为学衡派反对文学革命的罪证。对学衡派的这种恶感一直持续到80年代。

在对学衡派文学观的研究中，海外学者也先行着鞭。1980年台湾出版的《新文学运动的阻力》是笔者目前所见，比较全面、客观地研究学衡派的最早著作。³⁶台湾学者侯健是学衡派的重要研究者，他在70年代初就开始对新人文主义的文化、文学主张进行介绍和评论。³⁷1974年出版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书对学衡派研究颇为深入，其中《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的思想与主张》一文尤其值得关注。其研究视野非常广阔，在横向上注重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的互动，在纵的方面把学衡派、梁实秋以至于钱钟书都联系起来，还论及甲寅派等，其中有不少材料是大陆学者很少注意的。第二，关于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以及学衡派的“古典”特色，他分析得非常深入、细致，这在目前的大陆研究者中也不多见。他指出，《学衡》以文化为体文学为用的宗旨、其贵族主义倾向、吴宓的推崇“主理派”文学批评、反对自然主义小说等观点都明显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作者对于学衡派的古典主义倾向也做了分析，但并非论述重点。³⁸

对于学衡派文学理论的“古典主义”特点，海外学者关注较多。除陈敬之、侯健以外，史华慈、李欧梵等都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史华慈认为，所谓“古典”表明的是超历史的审美标准和伦理原则，学衡派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最古典的代表，因此尽力维护。李欧梵认为，学衡派保卫文学遗产的见解流露出“古典情趣”，其弱点是对白话持居高临下的不信任态度。认为他们的忧虑是杞人忧天，因为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作品的品格。³⁹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大陆学者除少数人外，往

往对这个问题言之甚少。

90年代开始，学衡派的文学观也得到大陆学界的重新评价。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不多，大多数都是文化方面论文的一部分。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文白之争、模仿与创造之争、文学进化论等问题，但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一味批评，而是开始肯定这些主张的合理部分。大多数学者仍认为学衡派坚持文言是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但他们也指出：学衡派并不完全反对白话，他们反对的只是白话文的一统天下，希望给文言文保留一个位置。而且文学革命一方的某些观点也是偏激的，如废除汉字使用拼音等。关于文学的模仿和创造问题，研究者们认为，新文化一方主张创造，发扬作者的个性，有利于突破旧文学的框架。学衡派主张模仿，吸收传统文学的营养，可以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有益补充。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学者们指出：五四新文化派以文学进化论为理论武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学衡派则侧重文学恒定的道德内容和精神价值，双方都有其合理性。总的来看，目前大陆学者所做的工作还是以纠错、平反为主，难免有就事论事之嫌。但也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学论争背后隐含着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正如马钦忠所说的，文化革命从反对文言文开始，其目的是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彻底逆转人们的缅古心理情结。”^{④①}

大陆学者也注意到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文学观的影响。魏建等认为，学衡派与新文学阵营的对立其实是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分歧，前者侧重于终极关怀，后者侧重于现实功利。^{④②}陈厚诚认为学衡派吸收了新人文主义的人性二元论，强调文学在道德方面的影响，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道德批评模式。学衡派批评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和反传统倾向，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一次有意义的反思。^{④③}旷新年也注意到学衡派的这两个特征，并通过新人文主义的影响，把学衡派和梁实秋的文学观联系起来分析，这在大陆学者中是首次。他认为学衡派与新文学在根本观念上是对立的，前者的文学史观是古典主义的，后者则来自于历史进化论。^{④④}这些观点已经深入学衡派文论的内部，在理论上贡

献较大。

李怡在这个问题上也独树一帜。他不同意对新文学“偏激”的批评，认为从艺术的最终成果来看，五四新文学的成就远远大于学衡派。他还指出，学衡派错误地要将传统文化直接运用于现代文学创作，走不出传统文学的格局。在理论上，他们不了解新文学的创作实际，其文学思想往往成了“空洞的立论”。学衡派的价值在于引入一个相当宏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他们的贡献主要在“学术”而不是“艺术”的方面。^④作者对学衡派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但对学衡派在文学改良方面的成绩似乎评价过低。

总的来看，海内外学者都倾向于从文化背景上讨论学衡派的文学观，而对他们延续、改良旧文学这方面关注不多。学衡派热爱传统文学，但也并非墨守成规，也要求“改良”，只是没有新文学一方态度激进而已。吴芳吉在旧诗改良方面成绩显著，可以作为代表。旧体诗词在现代以来虽日益衰微，但一直没有中断，是白话新诗之外一条重要的支流。但长期以来，这些作者和作品一直被现代文学史所忽视，这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相信随着这项研究的开展，学衡派的旧体诗词写作也必然会得到重新评价。另外，研究者仍往往以吴宓、胡先骕、梅光迪为研究的重点，而忽视了学衡派其他成员的文学主张。学衡派内部也存在差异，在对待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态度上，存在着开放和保守的分歧。旧文学中的门户派别之争在《学衡》中也有反映，不能一概而论。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辨析过这个问题。相比起来，对学衡派的文学观与文学实践的研究不如文化研究那么深入，值得进一步分析。

四、学衡派人物研究

80年代以前，台湾《传记文学》就已经有学衡派主要人物吴宓、梅光迪、吴芳吉、柳诒征、缪凤林、黄节、姚华等的传记文章，虽有

个别错误，但大体符合事实，而且不乏有价值的史料和观点。大约10年以后，这些作者也引起大陆学界的重视，其中风头最劲的当然是吴宓。

1. 悄然兴起的“吴宓热”

吴宓在现代文学史上从来也不是一个风云人物，除了编辑《学衡》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他主要是一个学者和教授。解放后三十年间，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再版。“文革”期间，吴宓也受到迫害，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80年代以后，大陆才陆续出现了一些回忆他的文章。90年代以来，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股空前的研究热潮悄然兴起。

台湾《传记文学》在60年代就已有关于吴宓的文章。1962年10月号发表了杨树勳的《忆吴雨僧教授》，以回忆吴宓生平为主。其中虽有史料错误，如把《学衡》误记作《国衡》，把他们称为“国衡派”，但比较忠实地记录了吴宓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突出他的“直率”、不盲从等性格。萧公权的《谊兼师友的吴雨僧》（1971年2月号）侧重于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成就，尤其指出他写诗的特点是“说尽”，不拘泥于传统的“含蓄”美，在内质与外形并重的前提下更偏重前者，这些观点对今天的大陆学者仍很有价值。陈敬之最早对吴宓的生平、文学主张和创作进行全面研究，肯定其“至性至情”说抓住了文学的根本，非常精辟，而且指出他在比较文学方面的贡献。^{④5}

1990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是解放后大陆出版的关于他的第一本书，收录了不少回忆文章。^{④6}吴宓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他的故乡陕西，在这里先后召开了三届吴宓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三本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宓诗及其诗话》。^{④7}二是四川，1998年在重庆召开第四次吴宓学术讨论会，西南师范大学等对吴宓研究非常重视。三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宓与陈寅恪》^{④8}和他的讲义《文学与人生》^{④9}等。

1997年，张紫葛的《心香泪洒祭吴宓》^⑩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吴学昭、唐季常、周国平等人批评这本书是欺世盗名之作，林亚光、鄢烈山、曹念明等人则为该书辩护，认为对该书的批评是“左”的思想残余。这次论争几乎持续了一年之久，连海外学者都为此召开讨论会。1998年杨绛著文否认钱钟书批评过吴宓，又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至今余波未息。这些论争更提高了吴宓的知名度。吴宓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名人，不只他的学术成就得到承认，连他的性格、婚恋、生活轶事等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1998年可以说是吴宓的“黄金年”。十卷本的《吴宓日记》编辑出版，盛况空前。《吴宓自编年谱》也于同年再版。^⑪同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收录了吴宓的一些重要文章。2000年吴宓的第一本传记《情痴诗僧吴宓传》（北塔著）出版，兼及学术与通俗。^⑫到目前为止，吴宓的主要著作都已经面世。研究他的论文也不断增加，主要关注点仍是文化和文学，后者尤为突出。

与学衡派研究同步，研究者们对吴宓的文化观也非常重视。苏光文是较早开始研究吴宓的学者，他充分肯定吴宓对人类传统文化（孔子思想和古希腊文化思想）的弘扬，但指出他的传统文化救世观是不现实的。^⑬其他研究者也充分肯定吴宓融合国粹和西方文化的见解。^⑭苏敏认为吴宓代表了国际人文主义中的“中国儒家人文主义”。^⑮在讨论吴宓文化观的大量论文中，徐葆耕为《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所作的前言最有代表性。他指出：近代以来真正从文化意义上对“中西会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是从吴宓和学衡派开始的。作者还分析了吴宓思想的发展过程，即最初侧重于世界古典文化到30年代走向传统与现代的“会通”，还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经过中庸处理，使之中国化。^⑯总的来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吴宓的文学观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值得重视。

吴宓既是旧体诗人，又是翻译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很有创见。学术界对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重视，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他的诗歌

翻译和诗论，对他的旧体诗研究不多。

刘健芬《吴宓诗论浅窥》是大陆较早的专门研究吴宓诗论的文章，概括了四个特点：情真、三境理论、严守旧韵、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和爱国主义精神。肯定吴宓是中国比较诗学的创始人，他的创作和理论都堪称时代的佼佼者。（西南师大学报 1990 年第 4 期）同期发表的苏光文的《试谈主编〈学衡〉时期的吴宓》也认为吴宓是一位爱国诗人。孙法理认为吴宓中国古诗是单韵式、英美诗歌是复韵式的论断非常正确，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⑤7}

研究者对于吴宓的“三境说”（实境、幻境、真境）非常关注，这是吴宓文艺理论的精华。陈建中提出“三境说”是西方古典的模仿论和中国传统的“境界”理论的融合，他的“幻境”隐喻思维完满地修复了旧模仿论和现代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的裂痕。^{⑤8}蔡恒等认为吴宓的“诗三境说”深刻地概括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密切融合的特点，论证了想像力的审美功能。他的想像力理论、剪裁理论等，都是从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而又能发扬传统，自成一家。^{⑤9}

吴宓的文学观有其深刻的哲学背景。周国平认为吴宓以一种整体的人生哲思把文学与人生贯通起来，把文学研究变成了人生探索的一种方式。他表达的是一种古典的人文信念，即治学的目的不在获取若干专门知识，而在自身的精神完善。^{⑥0}

研究者们对吴宓的译诗也有很高的评价。陈建中认为吴宓的译诗合乎他自己提出的“切挚高妙”的诗歌理想，反映了中庸古典的审美情趣。作者把吴宓、郭沫若、梁实秋三人的《鲁拜集》(Rubaiyat)译本作比较，认为吴宓的译本最好。^{⑥1}戴继国认为吴宓译诗兼顾信、达、雅，一般译者难以企及。^{⑥2}程麻指出，吴宓翻译朗费罗的长诗《伊凡吉琳》，体现了他强调投入真挚感情和体悟的创作与阅读态度，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注。^{⑥3}

吴宓在比较文学方面的成绩也得到认可。赵连元提出，吴宓是中国第一个学比较文学、教比较文学，第一个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国文学的人。^④韩国学者李泰俊认为吴宓自觉地把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范围里去讨论,使中国文学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在比较中寻求跨越东西方文学的共通的规律。^⑤朱徽认为吴宓的比较文学观也有缺陷,过分强调精神文化尤其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忽视了科学和物质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缺乏时代发展的观念。^⑥也有人认为以吴宓为比较文学鼻祖是夸大其词,^⑦但吴宓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吴宓的诗歌写作,王泉根认为吴宓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位以旧体诗放歌的悲情诗人。^⑧另外,关于吴宓的宗教观^⑨、戏曲写作^⑩等问题也有学者进行研究,这里不再详述。

总的来说,研究者们对于吴宓的文学观比较重视,成绩显著。吴宓近几年来如此受到关注,既和研究界对《学衡》的“再发现”有关,也得益于他与钱钟书、陈寅恪等的亲密关系,以及他昔日的学生、今日著名学者季羨林、李赋宁等的推崇。但更主要的还是他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创见。吴宓作为一位有自己体系的批评家,其地位应该得到现代文学史的承认。

2. 对学衡派其他成员的研究

与吴宓研究的热潮相比,学衡派其他成员显得门庭冷落。

《学衡》作者在学术上成果斐然,近年来,他们在各自学科领域的成就得到肯定,但他们与《学衡》的关系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1993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柳诒征评传》、《汤用彤评传》等,都列入《国学大师丛书》,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提到《学衡》。

对汤用彤等人的研究也往往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乐黛云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认为汤与《学衡》关系非常密切,他和吴宓早期创办的“天人学会”与《学衡》的宗旨一脉相承。他对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观点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⑪孙尚扬的《汤用彤文化思想探析》(上下篇)详细分析了汤

用彤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认为他为后世学人树立了求真、求自由的学术规范，提示人们可以在传统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困境的方案。^⑫

研究者们也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胡先骕和梅光迪。郑师渠的《新人文主义与胡先骕的教育思想》集中讨论胡的教育思想。认为他吸收了新人文主义的合理内核，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同时认为他无视东西方的差异，简单照搬新人文主义，结果必然失败。^⑬

台湾学者对梅光迪关注较早。1956年11月，台湾出版了《梅光迪文录》。侯健有《梅光迪与儒家思想》一文，收入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1979年林丽月的《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对梅光迪的生平和主要观点进行总结，认为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并非顽固的保守，只是强调对文化应审慎地进行选择。他理想中的新文化是“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在重新认定儒家思想价值、重建文化方面都有贡献。^⑭大陆学者黄兴涛却认为梅氏强调的“历史民性”和“吾国固有文化精神”实际上是保守传统的遁词，最终希望保存的还是孔孟之道，其思想实质仍然是“中体西用”模式的延续而已。^⑮

吴芳吉是学衡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歌创作在学衡派中成就最高，其代表作《婉容词》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只有《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录了他的简传，以后一直被文学史遗忘。台湾1970年重印出版了《吴白屋先生遗书》。^⑯80年代以后，他故乡的一些研究者整理出版了他的诗集等。^⑰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到目前为止，对吴芳吉的研究专著只有施幼贻的《吴芳吉评传》。^⑱论文数量也很少，其中贺远明的《白屋诗人吴芳吉的诗歌和诗论》比较有代表性。^⑲

学衡派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信徒，又是新人文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他们提出了与五四新文化派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学理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文化主流的有益补充。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他们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作为一个蕴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学衡派的研究潜力依然很大。

-
- 注①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东亚书局，1970年7月初版，1978年12月第3版（修订版）。
-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台湾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元月初版，1980年4月第3版。
- ② 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原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4月号 收入作者编选的《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代序。
- ③ 谭桂林：《评近年来对学衡派的重估倾向》，《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2期。
- ④ 沈卫威：《吴宓与〈学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17页。
- ⑤ 段怀清：《三个层面、三条途径、三种结果——欧文·白璧德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
- ⑥ 鲁迅：《估〈学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77页，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署名“风声”。
- ⑦ 周作人：《恶趣味的毒害》见《晨报副刊》1922年10月9日，转引自段怀清《三个层面、三条途径、三种结果——欧文·白璧德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
- ⑧ 九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8月第1版，1984年11月。
- ⑨ 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 ⑩ 张光宇：《中国社团党派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 ⑪ 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⑫ 章绍嗣主编《中国现代社团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569页：“该派宣扬复古思潮，其目的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 ⑬ 孟繁华：《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九十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张颐武：《新保守精神：价值转型的表征》，《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总第4期）。
- ⑭ 劭汉明：《“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总第4期）。
- ⑮ 傅乐诗：《五四的历史意义》，载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台北，1979年，转引自《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摘要》，刘桂生、张步洲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 ⑯⑰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04~505页，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
- ⑱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1989年《中国文化》创刊号。
- ⑲ 李建中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探讨中国文化走向的有三派：西化派、国粹派、折衷派，分别以胡适、梁漱溟和学衡派为代表。见《试论〈学衡〉诸子的文化模式与历史命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徐葆耕认为学衡派是最早从文化意义上对“中西会通”进行全面研究的，因此把他们命名为“会通派”。见《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徐葆耕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龙文懋认为“学衡派的文化主张应该归于‘改良’一类，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战中真正的保守派是分别以梁漱溟、杜亚泉、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派、《东方》杂志派和国粹派”。见《一个现代唐吉珂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

- ①⑨ 《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张明策划，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 ②⑩ 徐传礼：《关于学衡派和新青年派论争的再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 ⑪ 旷新年：《学衡派对现代性的反思》，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4月号。
- ⑫ 旷新年：《学衡派与现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6期。
- ⑬⑭⑮⑯ 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⑰ 旷新年：《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 ⑱ 张运华：《吴宓与新人文主义》，《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 ⑲ 李建中：《试论〈学衡〉诸子的文化模式与历史命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⑳ 罗岗：《历史中的〈学衡〉》，原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第1版。
魏建、贾振勇：《“学衡派”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 ㉑ 孙尚扬、郭兰芳编选《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1995年12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汤一介主编）之一。
- ㉒ 王泉根：《吴宓主编〈学衡〉杂志的初步考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 ㉓ 罗岗：《历史中的〈学衡〉》，原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第1版。
- ㉔ 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 ㉕ “林琴南们对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15日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
- ㉖ 李何林：《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87）》，生活书店1939年初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 ㉗⑸ 陈敬之：《新文学运动的阻力》，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4，成文出版

社有限公司 1980 年 7 月 10 日出版。

- ③⑦ 侯健：《白璧德与其新人文主义》，原载《中央月刊》5卷4期1973年2月
《白璧德与当代文学批评》，原载《中央月刊》6卷10期1974年8月。
译文《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白璧德演讲词）都收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74年12月，中文文学月刊社出版。
- ③⑧ 侯健：《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的思想与主张》，收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 ④⑩ 马钦忠：《白话文运动的文化针对性与崇古情结》，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 ④⑪ 魏建、贾振勇：《“学衡派”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 ④⑫ 陈厚诚：《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 ④⑬ 旷新年：《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批评》，收入《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 ④⑭ 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 ④⑮ 吕效祖主编《吴宓诗及其诗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 ④⑯ 吴学昭编著《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 ④⑰ 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 ④⑱ 张紫蔓：《心香泪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 ④⑲ 《吴宓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版。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1998年2月第2次印刷。
- ④⑳ 北塔：《情痴诗僧吴宓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 ④㉑ 苏光文：《试谈主编〈学衡〉杂志时期的吴宓》，《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吴宓的“好梦”及其“难圆”——〈学衡〉存在期吴宓文化启蒙蓝图剖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
- ④㉒ 张华：《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王泉根：《孤守人文精神的智者——吴宓与中国文化》，《红岩》1998年第2期。
- ④㉓ 苏敏：《层层改变嬗变而为新——谈吴宓的文化价值取向》，《红岩》1998年第6期。
- ④㉔ 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前言》（该文作于1995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 ④㉕ 孙法理：《中英诗歌韵式之比较和中国新诗韵式的发展——为纪念吴宓老师98岁冥寿而作》，收入《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李赋宁、孙天义、蔡恒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 ④㉖ 陈建中：《关于吴宓的“三境说”》，《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 ④㉗ 蔡恒、杜黎均、姜丁名：《吴宓“诗三境说”的美学价值》，收入《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 ④㉘ 周国平：《理想主义的绝唱——读吴宓〈文学与人生〉》，《红岩》1998年第1期。
- ④㉙ 陈建中：《评吴宓的译诗》，收入《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 ⑫ 戴继国《率真与达雅——吴宓译诗管窥》，《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
- ⑬ 程麻：《吴宓改译〈沧桑艳〉辨析》，《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2期。
- ⑭ 赵连元《吴宓——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3期。
- ⑮ 李泰俊《吴宓与中国比较文学》，《红岩》1998年第6期。
- ⑯ 朱徽：《论吴宓的比较文学观》，《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 ⑰ 叶兆言：《阅读吴宓》，《收获》2000年第2期。
- ⑱ 王泉根《孤守人文精神的智者——吴宓与中国文化》，《红岩》1998年第2期。
- ⑲ 王本朝《宗教作为一种可能的现代价值资源——论吴宓的宗教观》《红岩》1998年第6期。
- ⑳ 马家骏《试论吴宓先生的戏曲》，《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 ㉑ 乐黛云：《“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 ㉒ 孙尚扬《汤用彤文化思想探析》（上下篇），连载于《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4、5期。
- ㉓ 郑师渠《新人文主义与胡先骕的教育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 ㉔ 林丽月：《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载汪荣祖编《五四文学论文集》，台北1979年。转引自《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撮要》，刘桂生、张步洲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 ㉕ 黄兴涛《论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梅光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 ㉖ 《吴白屋先生遗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二月第1版。
- ㉗ 《白屋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吴芳吉逝世五十周年纪念集》 重庆江津县文化局编，江津县印刷厂印，1984年10月。
《吴芳吉集》，贺远明、吴汉骥、李坤栋编，巴蜀书社1994年10月第1版。
- ㉘ 施幼贻《吴芳吉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 ㉙ 贺远明《白屋诗人吴芳吉的诗歌和诗论》，《文史杂志》1992年第1期。

[张贺敏 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98级研究生 邮编510275]